

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

• 唐少傑

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最有影響的群眾造反組織。本文對該兵團的幾個問題作一評述，僅供文革研究者參考。

一 兵團的由來

1966年6月初，清華大學文革運動開始。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影響下，清華學生開始張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6月8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了528人的工作組進校。13日，工作組宣布停止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的一切職務，由工作組代行領導職權，工作組成員接管學校各級組織。12日至16日，103名清華幹部被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清華大多數幹部被置於「上樓」^①檢查、「下樓」過關的境地。工作組把112人定為走資派，16人打成反動學術權威，50多人當成牛鬼蛇神，清華處於混亂、癱瘓狀態。工作組力圖把清華文革運動納入他們的領導軌道，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受到一些師生的反感或牴觸。6月15日，工程化學系902班蒯大富等十幾人開會決定與工作組抗衡。16日至25日，蒯大富等人多次貼大字報抨擊工作組及其領導人。工作組從6月24日至7月17日多次在全校範圍內組織批判、鬥爭蒯大富，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蒯先後以上告、絕食、出走等行動表示絕不妥協。6月19日至8月3日，王光美先是以「蹲點」後是以組員的身分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工作。7月中旬，毛澤東嚴厲批判劉少奇等人的工作組路線，清華園內的形勢急轉直下。7月22日，工作組尚未撤離，王力等接見蒯大富並表示支持。8月4日夜，北京市新市委在清華召開工作組問題現場會，周恩來講話，為蒯平反。自8月起，清華乃至全國的文革進入了以紅衛兵造反運動為先鋒的階段。

「紅衛兵」起源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6年5月29日，該中學少數出身革命幹部、工農家庭的學生建立了名為「紅衛兵」的造反組織。8月1日，毛澤東寫

「紅衛兵」起源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6年5月29日，該中學少數出身革命幹部、工農家庭的學生建立了名為「紅衛兵」的造反組織。8月1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

1966年9月24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告成立。當時僅有十幾人，很快發展到數千人。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青睞和提攜。12月19日，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合併，召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大會。由此，井岡山兵團崛起成為在清華大學獨佔鰲頭並在北京乃至中國獨領風騷的紅衛兵組織。

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從此，紅衛兵運動及其組織風靡中國，震動世界。紅衛兵運動成為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全社會性的造反運動。

清華大學本科生的紅衛兵組織出現於工作組被正式撤銷之後。8月8日，唐偉、汲鵬、陳育延等成立串聯會，討論工作組性質並批其資反路線，這些被稱為「八八」派的人於8月22日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8月9日，賀鵬飛、劉濤、劉菊芬等成立串聯會，只批黑幫而迴避工作組問題，這些被稱為「八九」派的人於8月19日組成「清華大學紅衛兵」。除了這兩派以外，還有一些紅衛兵組織相繼出現。9月24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告成立。當時僅有十幾人的井岡山紅衛兵發表了一系列聲明，提出了三大口號：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為蒯式人物(被工作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平反。實際上，1966年7月底至11月，清華大學處於無政府狀態。當時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和「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主席團」先後掌握學校形勢。這些被稱為「三臨」的清華紅衛兵領導機構並未得到廣大學生的一致承認和擁護。由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及中共中央內部的情況，以高幹子女為主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始終處於被動狀態，其領導人於9月29日宣布自我罷官，一部分成員轉而成立了造反兵團支持蒯大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分化為八八總部和臨時總部。相比之下，井岡山紅衛兵不斷壯大，很快發展到數千人，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青睞和提攜，蒯大富在9月出任「首都大專院校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三司」)司令就是證明。12月19日，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兩個總部宣布合併，召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大會。由此，井岡山兵團崛起成為在清華大學獨佔鰲頭並在北京乃至中國獨領風騷的紅衛兵組織。

二 兵團的崛起

成立伊始，兵團進行了兩方面的鬥爭。一是加緊「圍剿」清華大學紅衛兵。該紅衛兵中有人在11、12月貼出反對中央文革、痛斥江青、懷疑林彪、批評文革運動的大字報和標語。兵團大舉反擊，終於使該組織崩潰瓦解。二是響應中央文革的意圖，把批判劉少奇的鬥爭推向新階段。12月18日，兵團成立的前一天，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約見蒯大富，並對鬥劉問題作了交代。張春橋絕不會以個人身分來交代此事，他的身後肯定有更大的指使。12月25日，清華大學5,000多名紅衛兵和教職員工分五路進城，上午10點在天安門廣場會合，然後又分五路，在天安門前、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進行「大宣傳、大遊行、大示威」，他們沿路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呼喊口號，召集短會，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搗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勢廣泛地引向社會。這一被兵團稱為「重大戰役」的活動整整進行了一天。與之相應，兵團於1966年的最後一天在其發行全國的《井岡山》報上，以專刊形式

發表了劉少奇之女劉濤的長篇檢查，從家庭內部來揭露劉少奇、王光美鎮壓文革、鬥爭蒯氏的「罪過」：並於1967年的第一天在同一報刊上發表〈炮打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有關文章，列舉劉在中共歷史上的12大「罪狀」。1月6日晚，兵團一些人以劉少奇、王光美之女遭車禍之名，把劉、王騙至醫院，然後「智擒」王光美到清華園，連夜舉行全校批鬥大會。在鬥劉問題上，兵團心領神會地充分發揮了中央文革的意圖，以自己的群眾「戰役」完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戰勝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一個回合，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反劉、鄧路線的突擊隊。

兵團因自己的「戰果」而身價倍增，並近於如癡如狂。1967年1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不奪權，就是對人民極大犯罪。奪權，就是捍衛黨的領導，就是捍衛無產階級。奪權，是無產階級派的當務之急。此時不奪，更待何時！」「真正的革命派，應該滿腦子裏想的是奪權，眼裏看的是奪權，雙手幹的是奪權。」「有人笑我們滿腦子權權權，是一個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對！我們就是滿腦子權權權，就是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在政權問題上，我們就是毫不含糊，當仁不讓！我們寧可做『野心家』，也不願當糊塗蟲、馬大哈。」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不久，兵團更加執着於在清華園外搶權、奪權。兵團的無政府主義和反權威主義傾向一發難於收拾。自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兵團內就不斷出現咒罵周恩來、懷疑康生、批評中央文革、否定陳伯達、斥責江青、抨擊謝富治，甚至對毛澤東、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團內的許多人實際上以知識份子狂熱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心緒置身於文革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兵團在許多場合格外炫耀他們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特殊關係。根據形勢的需要，竭盡所能地吹捧江青等人，宣傳自己與中央文革之間的親情，以中央文革的嫡系而自居。這往往帶有政治上的虛偽和投機成分。一個花絮：1967年5月5日，蒯大富風聞聶元梓請陳伯達當北大校長，於是他寫信給周恩來，請求周恩來當清華校長，周恩來5月6日回信辭絕。

甚麼是文化大革命？兵團有關頭目認為，關於文革的本質應從黨群矛盾、幹群矛盾去理解。如果只是看到一小撮走資派的問題，那是永遠不能理解文革的，因為黨群矛盾、幹群矛盾比起與一小撮走資派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文革的本質。所以，兵團把基於這種文革本質的理解而來的奪權經全面付諸自己的全部歷史活動中。一方面，兵團把揪鬥走資派的鬥爭普及而又深入地引向整個北京乃至全國。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1967年4月10日，兵團在清華主樓廣場前召開30萬各界群眾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把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兩百多名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揪來陪鬥，力圖把全部走資派置於死地。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兵團遠不滿足於鬥爭走資派，因為兵團把目光和矛頭伸向打倒走資派之後的現今的當權派，它已遠遠不滿足於稱霸清華甚至北京，而要在全國文革運動中叱咤風雲、左右形勢。幾乎在當時的每一文革熱點地區和部門，兵團都曾插手或介入。僅1967年3月至9月，兵團（包括兩派的）先後向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的30多個市、地區派出了近千人（一說600人）的

1967年1月6日晚，兵團一些人以劉少奇、王光美之女遭車禍之名，把劉、王騙至醫院，然後「智擒」王光美到清華園，連夜舉行全校批鬥大會。在鬥劉問題上，兵團心領神會地充分發揮了中央文革的意圖，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反劉、鄧路線的突擊隊。



揪鬥走資派是造反派組織的重要活動。圖為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學院舉行的10萬人批鬥彭德懷、張聞天大會。

80多個聯絡站、記者組，直接干預當地的文革運動。在北京，兵團更是積極關注黨、政、軍、學等部門的文革運動及權力鬥爭：參加歷次的重大事件或活動，如1967年7月下旬在中南海西門的「揪劉火線」和8月22日衝擊英國代辦處：充當北京各高校紅衛兵造反組織縱橫向聯繫（「首都紅代會」）執牛耳的角色：動輒以大規模的群眾行動把自己的主張和要求廣泛推向社會。

兵團對打倒走資派之後剛剛建立起的當權派權威的動搖和衝擊，就是試圖把當權派現有的、即使是暫時的秩序納入到自己非黨的群眾組織的控制之中。1967年春夏之際，兵團對當權派的干擾達到了高潮。4月，兵團開始參與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即奪軍權的鬥爭。武漢「7·20事件」後，兵團頭目認為文革開始進入衝擊軍隊、解決軍權問題的新階段，而軍權問題就是軍隊裏的山頭勢力。7月29日，在兵團作戰部長帶領下，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大量文件，並企圖綁架徐向前。8月1日，批鬥彭德懷、羅瑞卿，點名抨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等人。7月至9月，團派派出許多軍事動態小組，分赴各大軍事單位或戰略要地，收集有關部隊番號、軍隊動向及軍事首長狀況等極密情報，繪製有關圖表，力圖使軍隊大亂。在7月26日、30日兵團主持召開「全國造反派頭頭形勢討論會」之後，兵團許多人熱衷於支配一些地區的「文攻武衛」，部分頭目更親臨有關地區，儼然以通天使者的身分指導外地造反組織，參與並指揮武鬥，甚至衝擊或佔領軍事單位，毆打軍事人員，搶奪軍用物資，使外地對立兩派群眾的積怨加劇，給已經混亂的生活及環境帶來了更深的危機和災難。兵團彷彿是要在衝擊社會有序生活（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的無序運動中，尋求實現自己的價值及功能。

正如414在1968年4月發表的〈這是為甚麼？〉一文中責問團派的：「為甚麼清華團總部在全國各地無一例外地到處反軍區、反革委會，而且是在各地揪軍內一小撮的急先鋒？打倒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李再含、劉格平等第一炮幾乎都是清華團派打響的②，這是為甚麼？」原因之一：一旦當權派的權威阻礙以兵團為代表的造反派要權、搶權、奪權，或是這種權威有礙於群眾組織之間重新瓜分權力時，這種權威就應被打倒。在兵團興盛之際，就有20多名成員因嚴重觸犯了這種權威而先後被捕入獄。這種得到兵團（至少是團派）的領導和群眾默認甚至慫恿的冒犯現有權威，可以說是兵團的「天性」。兵團的所作所為，把伯恩施坦的「目的算不了甚麼，運動就是一切」的機會主義哲學轉換成「權威算不了甚麼，奪權就是一切」的造反哲學。

兵團身居高校也很重視教育問題。它深知文化、教育界和意識形態領域對文革發端的重要，所以多次在不同範圍的師生中廣泛討論教育革命，竭力把高校教育契入空想共產主義的模式中。兵團把每日上午8至10時定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間，把軍訓、學工、支農，把近於無政府狀態的內外串聯和召之即來的大字報、集會、遊行、武鬥等等當成了高校教育的主要內容，結果使當時六屆在校的逾萬名學生於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所上的課程和所學的課堂知識少之又少。兵團的教育革命不僅是反知識、反傳統的，也是反啟蒙、反現代的。兵團在當時還設計出整個高校教育革命的烏托邦藍圖。例如，1967年11月，兵團招生工作研究小組發表《關於改革大專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議》，提出為「堅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應對各階級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貧下中農子女應佔65%以上，剝削階級子女不超過5%。招生必須貫徹以群眾推薦為主，考試為輔的步驟來進行。推薦應佔招生人數的60%左右；為縮小城鄉差別，農村推薦學生應佔20%—25%。對五類學生不予錄取：家庭直系親屬中有被專政機關鎮壓者，走資派、牛鬼蛇神子女未與家庭劃清界限者，文革中參加過反動組織的屢教不改者或反動言行者，不參加文革的逍遙派、書呆子。對於大學招生，「今後要徹底廢除單純分數考試制度」，「可實行開卷考試」。大學入學語文考試，考生可交一份文革中自己寫的大字報底稿。兵團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構想未能在時間中得到充分推行，只有1970—1976年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算是為上述構想作出了漫畫式的歷史腳註。

兵團的領導和群眾默認甚至慫恿的冒犯現有權威，可以說是兵團的「天性」。兵團的所作所為，把伯恩施坦的「目的算不了甚麼，運動就是一切」轉換成「權威算不了甚麼，奪權就是一切」的造反哲學。

三 兵團的分裂

自兵團成立之日起，內部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兵團總部成立第三天，就有三名委員因分歧而退出。形成井岡山兵團之一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早在1966年7、8月間就在工作組鬥蒯大富一事上持中立態度，認為蒯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新左派。隨着兵團成立後各縱隊勢力的發展，以蒯為首的井岡山紅衛兵（又稱井岡山縱隊）與另三大縱隊（毛澤東思想縱隊、八八縱隊、東方紅縱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主要表現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勢評估、工作方法、權力分配、幹部政策、對文革前清華的評價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

是幹部政策。這些伴隨着兵團成立、發展而來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致使兵團於1967年4月分裂為井岡山兵團總部和414總部。在清華園內，前者又被稱為「團派」、「老團」，後者為「4派」、「老4」。因而，廣義上，兵團包括團派與4派二者在內，即使4派的正式名稱也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414總部」；狹義上，兵團特指與4派結成對立統一關係的團派，反過來說亦然。不僅團派把自己有別於4派並以兵團正統自居，而且4派也自視為與團派平起平坐的兵團主流。兩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斷升級，導致雙方走向衝突、武鬥，最終導致它們各自的組織以至整個兵團的消亡。兩派的關係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3月為分歧階段。兵團剛確立自己在清華的主導地位，原井岡山紅衛兵便加緊擴大和鞏固自己的權力。一是對非井岡山紅衛兵加以限制，以聯合、團結為由，指責那些不滿於兵團總部某些主張和策略的所謂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甚至給昔日盟友扣上「托派」的帽子，下令解散敢提批評的戰鬥小組；二是對自己的嫡系倍加關照，即使他們犯了「錯誤」，也內外有別；三是以「我」為中心，下令解散非井岡山紅衛兵縱隊，強化自己的集權；四是否定清華幹部特殊論，認為清華幹部必須自己站出「亮相」才能定性，卻又獨自給原清華校級幹部定性並決定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針對這些，非井岡山紅衛兵認為，造反派不等於革命派，奪權前與奪權後的紅衛兵不能一概而論，井岡山紅衛兵不能一統清華天下，包辦一切。兵團總部迫於壓力，多次進行整風活動，但從未達到內部思想上的統一。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兵團面前：如何對待急於要求「解放」和工作的原清華中、基層幹部？

(2) 1967年4月至8月為分裂階段。1967年《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評論員文章及調查報告，批判清華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篇文章在清華園引起很大反響。4月14日，由五個縱隊等組織召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成立了「414革命串聯會」，藉《紅旗》上的文章來批判那種否定一切幹部的做法。該串聯會隨後與兵團總部進行了多次會場辯論和會場糾紛，前者要求為幹部平反、平黑，後者要求幹部自己起來造反。4月29日，原團委副書記譚浩強、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代表147名原中、基層幹部發表致革命幹部公開信，認為幹部們受了10個月的迫害，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指責兵團的幹部政策有缺點、錯誤。這封信是對414串聯會的響應和支持。兵團總部反駁說，譚等不是中央文革肯定的幹部，上述公開信是「復辟舊清華的宣言書」。5月9日，414已不參加兵團會議，而自己單獨召集會議。4月30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1人）成立，兵團總部封它為在革委會成立之前的校臨時領導機構。兵團總部對414既打又拉，由不承認414的合法性到被迫承認414，都是為了盡快建立革委會。5月12日和21日，謝富治來清華促使兩派達成四項聯合協議，確定了擴大的22人的革籌小組名單。414群眾指責自己代表的妥協，拒絕四項協議中關於必須執行革籌小組和兵團總部的決議條款。5月24日，兵團總部下發革委會成員討論名單，要求一定要在5月30日成立清華革委會。414針鋒相對，拒絕參加自己只佔少數席位的革籌小組及成立革委會的一切準備工作。5月29日凌晨，

1967年4月分裂為井岡山兵團總部和414總部。前者又被稱為「團派」，後者為「4派」。兩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斷升級，導致雙方走向衝突、武鬥，最終導致它們各自的組織以至整個兵團的消亡。

414廣播台宣布成立414總部，發表成立宣言，正式與兵團總部決裂。5月30日，由於轉來周恩來不出席成立大會的通知及意見，最主要的是414的致命一擊，使團派的革委會之夢永遠消失了。6、7月，兩派儘管試圖聯合，但由於團派堅持必須執行四項協議，而4派堅持自己的總部與團派總部對等的原則，使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

(3) 1967年9月至11月為暫時聯合階段。迫於種種壓力，兩派於9月21日成立了兵團聯合總部，並於11月8日才遲遲正式宣布成立聯合辦公室、聯合廣播台、聯合政治部，取消各自的相應機構，組成由團派17人、4派16人為委員的聯合總部委員會。團派有些人對此深為不滿，拉出了自己的組織「鬥私批修聯絡站」，聲稱要「鬥蒯大富的私，批414的修」，因為蒯急於要當聯合之後的革委會頭頭，而414內部有人炮打陳伯達及中央文革，給團派排擠4派找到口實。兩派的矛盾沒有因為暫時的、表面的聯合而縮小，反而變得更加尖銳和擴大，雙方發生了武鬥及衝擊對方會場、辦公場所的事件。兩派都已意識到更大規模的武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4) 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中旬為糾紛和武鬥階段。自1967年12月起，兵團文革運動的重點已完全轉向校內，團派與4派的對立愈益集中在如何評價文革前的清華及其幹部的問題上。團派認為，文革前17年的清華是黑線專政，幾乎無可取之處。清華的幹部，尤其是50年代培養並相繼任職的，是資反路線的第三、第四套班子。這些幹部作為「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起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更加反動與危險。4派把團派的這套理論稱之為「大翻個理論」，即從根本上否定1949年以來的中共領導、顛倒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兩派的理論交鋒此時轉向行動中的衝突。由於原中、基層幹部大批倒向4派一邊，加上團派風聞4派將推舉原中層幹部出任未來的革委會領導（而團派麾下的革委會三結合幹部沒有甚麼代表性），於是他們以一首林彪語錄被改為414戰歌為藉口，於12月初下令通緝4派總部6名委員，其中一人被抓。12月4日，團派綁架、毆打和秘密關押了4派大力保護和推舉的原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領導人呂應中，並於12月6日、9日、20日查抄了20多名站在4派一邊或同情4派的原清華中層幹部的家，其中一些幹部被打傷，一些被抓走。兩派之間還發生了數十起小規模的流血武鬥。兩派互相衝擊對方的要地，大造聲勢，要盡可能的壓倒對方。12月25日，團派為紀念1966年12月25日行動一周年，便進城遊行宣傳，大叫要立新功，要為中共九大掃清道路，要造反派進入中共中央。次日，4派也進城遊行宣傳，直斥蒯大富想當中央委員，大拆團派的台。1968年1月3日下午，兩派為爭奪學生12號樓中的4派紅尖兵廣播室，發生了第一次有數百人參加的大規模武鬥，武鬥直至次日清晨才結束。1月30日（春節），任職4派總部宣傳部的羅征啟在家中被綁架，3月27日羅因不堪折磨逃離關押點，團派匆忙於當晚抓走工物系教師、4派辦公室幹部賈春旺等人，對之加以關押、毒打。2月23日，4派在給中共中央有關方面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幹部問題是清華建立革委會的關鍵，提議讓原清華黨委委員8至10人進入革委會，斷定由「革命小將」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是不適宜的，要求中央委派軍代表或他人擔任。4月4日晚，一直監視羅征啟家的團派保衛組抓走羅之弟羅征敷（北京第一機牀廠工人，

自1967年12月起，兵團文革運動的重點已完全轉向校內，團派與4派的對立愈益集中在如何評價文革前的清華及其幹部的問題上。

28歲)，毒打後用擦車棉紗堵住其嘴，並將他塞入後車廂，拉回清華，活活悶死。4月14日、15日，團派關押了所謂「羅文李饒」案中的文學宓、李康、饒慰慈、劉承嫻（皆為中層幹部，與羅一起支持4派的幹部政策）等人。此案造成3人死亡，20餘人受摧殘。4月20日，4派為了報復，抄了原電機系黨總支副書記、代書記陶森的家，把陶綁架至4派佔領的科學館，因為陶代表31名幹部批判了4派的幹部政策。4月23日上午，團派和4派開始了震驚中外的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5)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為「百日大武鬥」階段。關於這一階段，筆者有專文另述，這裏僅作簡要描述。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共有11人死亡，30餘人殘廢，300多人受傷。7月下旬，工人宣傳隊進校，又造成5名工人犧牲，731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逾千萬元。1968年8月之後，宣傳隊接管學校，團派、4派乃至整個井岡山兵團自行解散、消亡。

四 兵團的建制

兵團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兵團的正式領導機構是總部委員會，蒯大富、韓銀山、鮑長康、馬小莊、劉才堂、陳育延、陳繼芳、任傳仲、王良生任常委，後來是4派領導人之一的孫怒濤曾任過常委。除韓銀山為原行政處幹部，全部常委皆為在校學生。在1967年6月之前，至少在團派與4派真正形成對峙格局之前，這一總部實際上臨時負責清華大學的日常領導工作。總部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又稱一部）、政治部、後勤部等常設部門，每一部門都由其核心組負責領導工作。總部辦公室設有秘書組、電話組、常務組、資料組。作戰部設有對內作戰部和對外作戰部，前者轄部隊③辦公室、發放組、保衛組、三辦（專案）、鬥蔣兵團、大行動組、大批判組等；後者轄辦公室、社會調查組（又稱動態組，分為一動〔兵團動態〕、二動〔校內及414動態〕、三動〔首長講話及北京動態〕、四動〔中學動態〕、五動〔運事動態〕、六動〔國際動態〕6個小組）、全國聯絡站（辦公室、資料組、東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北組等）。政治部設有辦公室、宣傳部、學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辦（幹部辦公室）、組織部等。後勤部設有辦公室、科技組、財務組、生活組。根據情況需要，兵團還設置一些應急機構，如文攻武衛指揮部、「羅文李饒」專案組、呂應中專案組、鬥批改聯絡站、遵義學習班（學生學習班分部）、平型關學習班（幹部學習班分部）、戰地宣傳隊等。

兵團的組織建制是把各系、處等單位按軍事編制劃為01至15部隊（一度擴為20部隊），各部隊由若干戰鬥組構成。這些以革命術語或紅色詞句（如「契卡」、「刺刀見紅」、「指點江山」等等）命名的戰鬥組由人數不等、關係相對鬆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員組成。兵團的群眾性組織主要有以學生為主的28團、以職工為主的「清華大學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等。

兵團的宣傳機構有《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廣播台、前哨廣播台、井岡山通訊社、井岡山雜誌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主要由兵團宣傳部負責。兵

兵團的刊物信息量大、選題廣，在當時的北京及外地頗有影響。如，刻板油印的《井岡山通訊》在其發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數期，內容包括校內到校外、中央兼地方、工農商學兵幾乎各界的文革情況和動態。無疑，這些刊物對於了解和研究清華以及全國文革初期的歷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團在不同時間、不同範圍出版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井岡山雜誌》、《井岡山通訊》、《文化大革命簡報》、《學習資料》、《理論批判》、《整風簡訊》、《大字報選》、《內部資料》以及各動態組的有關動態等。這些刊物是由兵團總部的不同部門主辦的，其中有的刊物不僅信息量大、選題廣，而且在當時的北京及外地頗有影響。如，刻板油印的《井岡山通訊》在其發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數期，內容包括校內到校外、中央兼地方、工農商學兵幾乎各界的文革情況和動態。這些刊物表明，兵團重視信息情報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別重視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及有關負責人的講話、指示，力圖通過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輿論聲勢來加強自己的形象和影響；進而還表明，兵團在建有較健全的政治、宣傳等機構的同時，也擁有較發達的、輻射全國的情報機構，這在當時的群眾組織中是極為少見的。無疑，這些刊物對於了解和研究清華以及全國文革初期的歷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414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414革命串聯會」核心組之基礎上，於1967年5月底建立和發展起來的。414由其總部領導，總部委員有沈如槐、孫怒濤、陳楚三、劉萬璋、汲鵬、宿長忠、張雪梅、蔣南峰、李秀英、傅正泰、譚浩強、任彥申等54人。414總部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幹部辦公室、宣傳部、組織部、保衛組、幹部參謀組、鬥蔣作戰部、政治部、行政管理總勤務站、鬥批改辦公室以及後來的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作戰部設有第一作戰部(負責北京及校內)、第二作戰部(負責大批判)、第三作戰部(負責全國，轄辦公室、資料組、軍事組、東北組、華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北組、西南組)。宣傳部設有動態組、簡報組、廣播台、報紙編輯部、發放組。414總部儘管在規模上小於團派總部，但是它十分重視基層建設，在基層單位共有12個部隊(亦稱01-12支隊)和較完整的分部機構。414的群眾組織主要是以學生為主的東方紅戰團和以教工為主的二七戰團。414最盛時期自稱有7,000人。

414在不同時間、不同範圍出版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414戰報》、《情況簡報》、《井岡山參考資料》、《大字報選》、《清華414通訊》、《教革》、《聯合風暴》、《滿天紅》、《重要文件》等。這些刊物在創辦時間上晚於團派刊物，在選題範圍、信息含量等方面也難與團派刊物平分秋色。在報導有關校外文革情況時，兩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華文革形勢和兩派歧見時，兩派刊物才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兩派愈是到了後期，愈是利用各自刊物盡其所能地抨擊甚至詛咒對方。實際上，兩派刊物是「互補的」，即在一方的偏頗處可發現另一方的特色。若要「解讀」整體意義上的井岡山兵團史和清華文革初期史，這種互補性是不能忽視的。

以兵團為大轟的整個造反派的使命和作用在1968年秋瀕於結束，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兵團的歷史角色在於演出了一幕不是「革命吞噬革命者」，而是「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鬧劇！

五 幾點評價

(1) 兵團的歷史證明，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最難以駕馭的運動，群眾組織(包括造反組織和保守組織)遠不是黨的群眾組織。它們本身既是自發的，更是自覺的：既是瘋狂的，更是理智的：既「發祥」於黨的謀略，更超

越黨的約束。黨的鬥爭由非黨的群眾組織充當其主體和動力，並變為群眾運動，這是文革初期歷史的、必然的「二律背反」，也是整個文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可化解的矛盾癥結。

(2) 兵團的消亡標誌着文革初期造反派組織和個人在整體上的衰落，變本加厲的奪權，更主要的是曠日持久的內訌和武鬥，使得造反派組織和個人不可能適時地把其興起的社會動盪轉變為社會穩定。他們把舊體制打倒了，但卻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新體制。以兵團為大纛的整個造反派的使命和作用在1968年秋瀕於結束，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兵團的歷史角色在於演出了一幕不是「革命吞噬革命者」，而是「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鬧劇！

(3) 兵團的經歷所呈現於後人的是難以計數的大會、遊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激情奔瀉、內容枯燥的戰鬥文體，呼天喊地的聲討和蠱惑，如火如荼、近無人性的武鬥，風捲如席的綁架、抄家，對敵手無所不用其極的舉措，而自身既有文過飾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的惡習，更有追逐功名、嗜權如命的醜態……。略過這些，筆者要問：兵團的成員作為當時中國最敏感、聰慧、自視為最具有社會義務感和歷史責任心的青年學生，他們最缺乏的是甚麼？恰恰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精神！

(4) 兵團與其說是一個紅衛兵組織，莫如說是一種紅衛兵運動。紅衛兵組織作為文革中的青少年組織雖然延續了十年，但紅衛兵運動實際上只有兩年左右的歷史。這種紅衛兵運動儘管按照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來進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掃蕩，試圖為青年尋求一條變革社會而實現大寫的自我的途徑，但它從未擺脫專制及專制主義的羈絆，本身恰恰就是這種專制及專制主義的社會文化的二元怪物：即在思想上，它是一種反獨斷主義的獨斷主義；而在政治上，它是一種反極權主義的極權主義。它似乎成了60年代末青年一代反抗社會、拒絕權威破滅了的神話或偶像。紅衛兵運動既把大批判、大武鬥、大拒絕之火引向社會和人民中間，又把分裂和滅亡之火引向自身，它在企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歷程中走進了自我異化的歸宿。兵團在諸多方面給我們留下無窮的思索。

兵團與其說是一個紅衛兵組織，莫如說是一種紅衛兵運動。這種紅衛兵運動試圖為青年尋求一條變革社會而實現大寫的自我的途徑，但它從未擺脫專制及專制主義的羈絆。它在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歷程中走進了自我異化的歸宿。

註釋

- ① 掛職。
- ② 在此文「編者按」中還指團派在廣東要打倒黃永勝，在山東要打倒楊得志。
- ③ 系、處等單位的代號。

唐少傑 山東濟南人，1959年生。現任北京清華大學副教授。